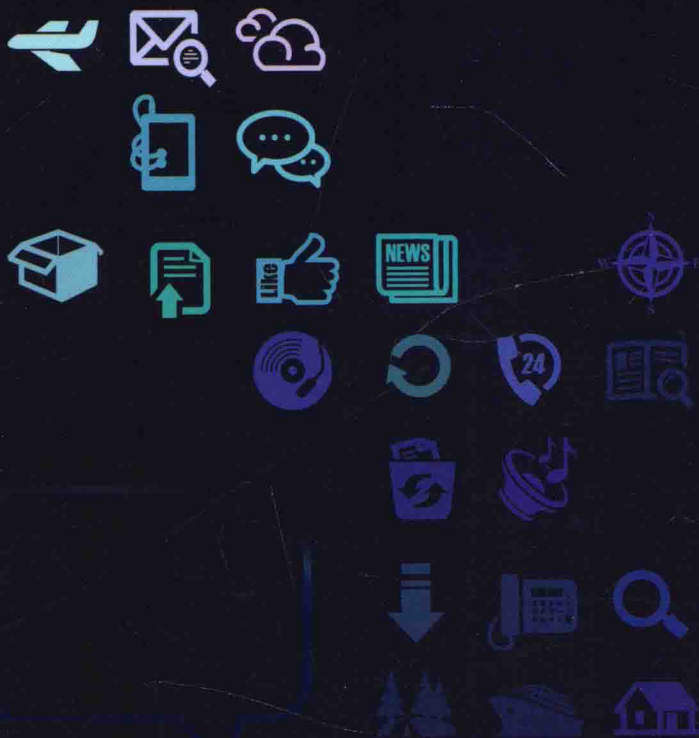


傳播新制度經濟學

傳播史、政策、管理與產業組織

王盈勛 著



傳播新制度經濟學

傳播史、政策、管理與產業組織

王盈勛 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傳播新制度經濟學：傳播史、政策、管理
與產業組織／王盈勛著。——初版。——
臺北市：五南，2014.04

面：公分。

ISBN 978-957-11-7540-9 (平裝)

1. 傳播產業 2. 媒體經濟學

541.831655

103002823



1ZEL

傳播新制度經濟學：傳播史、政策、管理與產業組織

作者 — 王盈勛 (5.7)

發行人 — 楊榮川

總編輯 — 王翠華

主編 — 陳念祖

出版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話：(02)2705-5066 傳真：(02)2706-6100

網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台中市區中山路6號

電話：(04)2223-0891 傳真：(04)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電話：(07)2358-702 傳真：(07)2350-236

法律顧問 林勝安律師事務所 林勝安律師

出版日期 2014年4月初版一刷

定價 新臺幣220元

目錄

自序	4
----	---

第一章 理論基礎	6
----------	---

- 壹、對傳播新制度經濟學的誤解與忽視
- 貳、消失的傳播研究奠基者：寇斯的傳播思想再發現
- 參、傳播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什麼？如何研究？
- 肆、結論

第二章 傳播史	38
---------	----

- 壹、傳播史：科技與制度
- 貳、加拿大學派的傳播經濟史觀
- 參、什麼是傳播新制度經濟史
- 肆、新制度經濟學與新制度主義的異同
- 伍、結論

第三章 產業組織與管理 58

- 壹、過去傳播產業組織的研究
- 貳、新制度經濟學的傳播產業組織研究
- 參、不同的經濟學取徑對壟斷的看法
- 肆、產權理論，是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問題
- 伍、新制度經濟與傳播管理
- 陸、結論

第四章 傳播政策 83

- 壹、寇斯不怎麼贊成的寇斯定理
- 貳、過去的傳播政策研究
- 參、傳播新制度經濟學的政策研究
- 肆、傳播新制度經濟分析中的政府角色
- 伍、超越國家與市場：公共領域的治理模式
- 陸、知識作為一種共用資源 / 公共財
- 柒、探索一種研究方法整合的可能性
- 捌、結論

索引 117

傳播新制度經濟學

傳播史、政策、管理與產業組織

王盈勛 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目錄

自序	4
----	---

第一章 理論基礎	6
----------	---

- 壹、對傳播新制度經濟學的誤解與忽視
- 貳、消失的傳播研究奠基者：寇斯的傳播思想再發現
- 參、傳播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什麼？如何研究？
- 肆、結論

第二章 傳播史	38
---------	----

- 壹、傳播史：科技與制度
- 貳、加拿大學派的傳播經濟史觀
- 參、什麼是傳播新制度經濟史
- 肆、新制度經濟學與新制度主義的異同
- 伍、結論

第三章 產業組織與管理 58

- 壹、過去傳播產業組織的研究
- 貳、新制度經濟學的傳播產業組織研究
- 參、不同的經濟學取徑對壟斷的看法
- 肆、產權理論，是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問題
- 伍、新制度經濟與傳播管理
- 陸、結論

第四章 傳播政策 83

- 壹、寇斯不怎麼贊成的寇斯定理
- 貳、過去的傳播政策研究
- 參、傳播新制度經濟學的政策研究
- 肆、傳播新制度經濟分析中的政府角色
- 伍、超越國家與市場：公共領域的治理模式
- 陸、知識作為一種共用資源 / 公共財
- 柒、探索一種研究方法整合的可能性
- 捌、結論

自序

傳播學門是個相當獨特的領域。

很多學子之所以選擇傳播相關科系就讀，是因為和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傳播科系似乎較為接近「產業」，唸起來有趣，未來的前途似乎也較為看好。

但這與產業的接近性與對應性，也是這個學門內在張力的根源。對於左翼批判傳播出身的學者而言，媒體的內容具有公共性，不能輕言被私有化與商品化；對將傳播視為一個產業的研究者來說，這個產業如何才能蓬勃發展，提供更多元化的媒介內容與服務，才是值得關心的問題焦點。

落實到傳播研究理路的進程，左右兩端則是各自發展出傳播政治經濟學與傳播產業經濟學兩個研究脈絡。這兩大傳統，要不是互不往來，就是互為政治與學術思想上的假想敵人，在政策的辯駁上，則是有志一同地在國家（公共性的主要維護者）與市場這兩種體制間往返。

這本書試圖要探索的，則是新制度經濟學作為一種方法，如何能開拓傳播研究的經濟分析思路，並在前述兩者之間，找到對話與開展新局的可能。

本書第一章透過介紹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者寇斯 (Ronald H. Coase) 的傳播研究，勾勒傳播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论基礎；第二章陳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如何應用於傳播史的研究，並比較分析其與科技導向的傳播史研究取徑間的異同；第三章著眼於新制度經濟學在傳播管理與產業組織分析中的位置，並闡述新制度經濟學對關鍵傳播議題，像是壟斷、傳播內容屬性與所有權的解釋與分析方法；第四章探討新制度經濟學的政策研究意涵，並試著為傳播政策的國家 / 市場難題尋求可能的解答。

巧合的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四位關鍵人物：寇斯、諾斯 (Douglass C. North)、威廉森 (Oliver E. Williamson) 以及奧斯特羅姆 (Elinor Ostrom)，分別在 1991、1993、以及 2009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最後兩位同年獲獎），在本書中也將從基礎理論、史學、管理與產業組織、以及政策分析的角度介紹其理論，並申論其在傳播理論的應用。

第一章 理論基礎

以經濟的分析方法來研究傳播產業或是傳播現象，主要援引經濟學的兩個理論脈絡：一為產業經濟學，另一個是政治經濟學。¹ 在這兩大理論傳統的牽引之下，傳播學門出現了兩個次學門，分別是媒體經濟學 (media economics) 和媒體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

這兩大傳統，位處政治光譜的兩端，媒體經濟學延襲了主流經濟（新古典）理論的右翼傳統，媒體政治經濟學則是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左翼資產。

在傳播學界，受到這兩個理論傳統的影響與制約，對於傳播制度與政策的分析，幾乎都是集中在兩種極端的制度或體制間的往返辯駁：公共 (public) 與市場 (market)。

這種非公共即市場的思維邏輯，固然在過去數十年間獲得豐富的研究成果，卻也限制了傳播的經濟（與管理）研究的諸多可能性。本書的目的，則是探討另一種取徑的可能性——新制度經濟學作為一種傳播研究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自從兩位經濟學家寇斯 (Ronald H. Coase) 與諾斯

1. 政治經濟學有許多不同的定義，最廣義的解釋幾乎等同於經濟學，這裡指的是「批判的政治經濟學」。

(Dauglass C. North) 在 1990 年代接踵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後，² 在經濟學界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有漸成顯學之勢。本章的主旨在於指出，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不但對於擴大傳播經濟研究的視野有極大的幫助，事實上，寇斯本人的著作本來就有很極大一部分是針對傳播產業，寇斯與傳統傳播領域的著作也有許多的對話。然而，寇斯的著作在傳播學界卻鮮少受到重視，也幾乎沒有人認為寇斯是「傳播學者」。

本章首先試圖為寇斯與新制度經濟學在傳播學界不被重視提出解釋，第二節初步探討寇斯的傳播思想，第三節則是分析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在傳播領域應用的可能性。最後則是探討新制度經濟學對當下傳播研究的意義，以及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傳統的傳播（媒介）經濟學之間的關係。

壹、對傳播新制度經濟學的誤解與忽視

新制度經濟分析在台灣、乃至全球的傳播學界能見度如此之低，主要有三個可能原因。一、未能區分新舊制度經濟學間的差異；二、與新古典主義的混淆；三、左翼傳統在台灣傳播學門經濟分析中佔據了主導地位。

2. 一般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山之作是寇斯發表於 1937 年的〈廠商的本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此外，寇斯也被認為是法律經濟學的鼻祖，寇斯便曾感嘆，作為經濟學家，他在法學界影響力卻大於經濟學界。

新舊制度經濟學的差异

傳播學界並非沒有制度經濟學的理论傳統。以加拿大為基地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脈絡，從殷尼斯 (Harold Innis)、史麥塞 (Dallas W. Smythe)、到貝比 (Robert Babe) 早期都是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出發，研究傳播現象。Mosco(1996) 便指出，「左派的異端立場，主要是從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取向，汲取論述」。

然而此制度經濟學非彼制度經濟學。Mosco 所說的制度經濟學，在現在的經濟學領域一般被稱之為「舊制度經濟學」。舊制度經濟的代表性人物包括康芒斯 (John R. Commons)、密契爾 (Wesley Mitchell) 等等。舊制度經濟學之所以對左翼傳統有重大影響，主要原因在於舊制度經濟的研究重心在於強調文化、風俗、習慣等等的「制度」對於經濟的影響力，並駁斥新古典主義一貫只強調價格（市場）的決定性力量。這樣的研究取徑，自然是相當投合左翼分析的脾胃的。

就「指出市場力量的限制」、挑戰新古典主義的基本假設這點來說，新、舊制度經濟學的確是有若干的共同點。但是寇斯指出，舊制度經濟學的問題在於反理論，因此留下來的，幾乎都是沒有理論價值的材料堆砌而已。新制度經濟的分析超越舊制度經濟之處，在於提出一套理論性的分析方法—價格（市場）機制的運用是需要的成本的，來探究新古典主義的限制之所在。

但是新制度經濟的分析方法歧途於左翼分析之處在於，新制度經濟的分析並不是要推翻新古典主義的基礎，而是要修正它，指出其不

足之處。或許也是這樣的歧異點，讓許多左翼傳播學者輕易地便將新制度經濟學劃歸在新古典主義的大旗之下。

與新古典主義的混淆

國內學者羅世宏(2003)提到寇斯定理時，將其歸類為「芝加哥經濟學派」。即使是一度以傳播制度經濟學者自居的加拿大傳播學者貝比，也錯誤地將寇斯歸類為新古典主義學派(Babe, 1996)。Posner(1995)便指出，並非所有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經濟學家都是芝加哥學派，寇斯便是個典型的例子。³

羅世宏(2003)所說的，「新制度主義以產權私有為優，卻未能證成私有化的產權配置是將(特別是政治及文化生產的領域的)(負面)外部性予以內部化的最佳或唯一手段。」這事實上也是對於寇斯定理的誤解。寇斯定理的要旨在於指出，在交易成本為零的狀況之下，只要將產權界定清楚，資源指派給誰，將無關資源使用效益的最大化。寇斯的這項推論，我們得從兩個層次來理解。

首先，寇斯指出，交易成本為零的狀況在真實世界中並不存在(也就是新古典主義所假設的狀況)，因此他認為討論交易成本為零的狀況沒有太大的意義。這也就是說，在真實的世界中，產權的配置確乎是會影響效率的一因為市場的運用是要耗費成本的。因此，在寇

3. 事實上寇斯到芝加哥大學任教之初，是受聘為法學院教授，而非經濟系。

斯眼中，價格或是市場機制絕非資源配置的「唯一最佳」手段。

其次，寇斯所說的將「產權界定」清楚，是指運用特定財產權利的明確判決或指派，至於財產權是劃歸給私人或是政府，則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了。換言之，寇斯從未有「產權私有為優」的這樣的論述出現。

至於說新制度主義「未能證成私有化的產權配置是將（特別是政治及文化生產的領域的）（負面）外部性予以內部化的最佳或唯一手段。」則是一項相當奇怪的說法，寇斯對於經濟理論最大的貢獻之一，正是在於推翻庇古(Cecil Pigou)所提出的「外部性」(externality)問題，又何來證成外部性效益最佳化與否的問題呢？寇斯(1988)認為，「我的文章（指社會成本問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在於證明，這些不良影響(harmful effects)，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外部性)可以像其他生產要素一樣來處理。這些不良的影響，有時應該加以消除，有時則否。要得到正確的結論，並不需要使用像「外部性」這樣的概念。」

Creative Commons 運動的健將雷席格(Lessig, 2004)便指出，寇斯定理有兩種，一為「適當的」寇斯定理(proper-Coaseans)，以及「產權的」寇斯定理(property-Coaseans)。產權的寇斯定理，顧名思義，唯產權是問，所有的資源都應該被產權化。對寇斯來說，產權絕對不是一件可以這樣簡化的事。在〈聯邦通訊委員會〉(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一文中，寇斯(1959)即已指出，「所有

的財產權都會阻礙人們使用資源的能力，我們必須確認，這樣的阻礙所獲得的好處大於它所帶來的損害」。因此，在決定要把產權指派給誰之前，我們得先確定，資源的配置是否該與產權有關。

這當然不是說新制度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毫無關係，或是沒有研究脈絡上的相承之處。諾斯(1993)指出，新制度經濟學並不是要推翻新古典主義、以及找出無效率市場的解釋原因，而是奠基在新古典理論之上，修正與延伸它。新制度經濟學接受資源有限，因此必然有競爭的假設一個體經濟學選擇理論取徑的基礎。新制度經濟學放棄的是新古典主義的工具理性—新古典主義是假設制度不存在的理論(institution-free theory)。

在工具理性的世界裡，制度是沒有必要的，理念與意識型態無關緊要。但是事實上，我們只擁有不完整的資訊和有限的心智來處理資訊，因此，人類藉以建構交換體系的互動是有所限制的。在這樣的世界裡，理念與意識型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新制度經濟學如何延伸或修正新古典主義？除了修正對於理性的假設以外，諾斯加入制度作為一個關鍵性的限制，以及分析交易成本作為制度與生產成本間的鏈結所扮演的角色。新制度經濟將理念與意識型態整合進經濟理論的分析當中，把政治視為是經濟表現的關鍵因素、作為不同經濟表現的促成因素、以及無效率市場的解釋原因。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其實也可以說新制度經濟學恢復了主流經

濟學研究的「政治經濟學」傳統。就這個層面來說，我們甚至可以說新制度經濟學和批判的政治經濟學有其共同之處。寇斯(1993)本人也將其在1951年移民美國以後，針對美國廣播電視產業的研究稱之為「廣播與電視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左翼傳統在台灣傳播學門經濟分析中佔據了主導地位

早期台灣的傳播學研究，絕少把關注的重心放在傳播機構是存活在市場機制底下，或是它本身就是個商業組織這個面向上面。自1990年代以降，在台灣的傳播學界，如同馮建三(2003)所指出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幾乎被等同於就是「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稍後也漸次興盛的「傳播管理」或是「媒體經濟」領域，則是擷取新古典經濟理論的產業經濟理論，研究的重心在於產業結構對於組織行為與績效的影響。

在左右夾擊，加上對於新制度經濟的誤解，傳播新制度經濟學在台灣的研究幾乎是一片沙漠。

貳、消失的傳播研究奠基者：寇斯的傳播思想再發現

很難想像，一個一生的學術著作幾乎有半數與傳播產業相關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卻全然不曾引起傳播學界的注意。依據Menard(2000)所選編的寇斯著作目錄，截至2000年1月為止，寇斯